

中國文人的魯迅姿態

● 葛紅兵

從「革命家」到「啟蒙者」

魯迅是中國二十世紀最偉大且最富影響力的文學家，其影響之大，令試圖否定他的人不得不肯定他，也令與他沒有關係的人要與他攀上關係。魯迅的魅力經久不衰，他有着二十世紀中國最痛苦、最深邃、最難言、最矛盾的靈魂。他是一個百寶囊。不同時代的人、同一時代抱着不同目的的人，都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各自想要的東西。中國知識份子，特別是中國當代的文學知識份子，總都與魯迅有着這樣或那樣的千絲萬縷的聯繫。魯迅姿態成了當代中國文學知識份子幾乎無法不用的一個角色面具。

說魯迅是當代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就中國二十世紀下半葉這一特殊時段而言是毫不過份的。曾幾何時他是政治權利唯一允許的文學話語，文學知識份子如果期望得到言說的權利，那就只能說魯迅，全國上下文學研究的對象只剩下一個「走在《金光大道》上的魯迅」。

魯迅生前就已經成為文學話語權利爭奪的焦點人物了。本世紀30年代，左聯內部兩個口號之爭便是一個例證。以魯迅為首提出的「民族革命

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和以周揚為首提出的「國防文學」的口號，其內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唯一的區別就是，誰的口號為文藝界接受，誰就擁有文藝界的實際領導權。因而，這場爭論並不是學理的爭論，而是一場文學界話語權利分割之爭。後來這場爭論依靠黨的組織力量來平息，實證明它的整個運作機制就是權利平衡。當時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壓制左翼行政領導人的思想和行為，並不是因為魯迅提出的新口號具有更深的學理性，而是因為黨需要魯迅在文藝界的威望，需要魯迅這面旗幟來吸引更多的作家。活着的魯迅就這樣走向文學界話語權利分割的前沿，成為一個砝碼，成為左翼作家使用的一個姿態。

對魯迅評價的定型，是從毛澤東在陝北公學魯迅逝世一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演(1937年)開始的。毛澤東在講演中說，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之後毛澤東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將魯迅說成是「文化主將」，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誠」的「民族英雄」。這個突出魯迅革命家身分的定位，與當時的民族民主革命形勢是相適應的，跟共產黨在

文學領域裏爭取大多數以推進抗日的、民主的、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文學的策略關係相呼應。這個定位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文革期間，魯迅成了毛澤東以外唯一一個有語錄本被印行的人，他是意識形態唯一允許的文學話語。借魯迅說話成了文學知識份子的職業本領，最終也成了他們無意識的本能，這使魯迅成為中國文人說話時的唯一姿態。政治化了的魯迅成了政治力量的權杖。

80年代，這一權杖悄悄地從歷史中隱退，但是，魯迅這個名字不但沒有像一些海外學者所預言的，被其他名字取代或者成為冷嘲熱諷的對象，相反，他依然佔據着文學知識份子的話語中心，其魅力不減甚至更盛。尤其在80年代，新啟蒙運動風起雲湧，他再次成為熱點，成為新啟蒙運動的一襲大氅。文學知識份子的啟蒙話語披着魯迅這襲大氅由邊緣地位向政治權利中心挺進，魯迅在這場話語的挑戰中，又成為新一輪話語權利爭奪的武器。「啟蒙家」魯迅「成為新啟蒙話語的一個中心的語項」。

90年代的兩種魯迅姿態

時近90年代，新啟蒙漸漸退潮，魯迅的地位似乎有所回落。然而，90年代中期以來，新一輪魯迅熱又再興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推出新註釋本《魯迅全集》，90年代多次重版，且每次再版印數都達數萬套。儘管書價年年漲，印數也相當可觀，但1994年以前出版的《魯迅全集》已全部售罄。此外，魯迅的單本著作也相當熱銷，如《吶喊》、《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編》等都是一版再版，其銷量遠遠超過了一般現當代文學作品。除了著作熱銷，魯迅的生平事迹

也越來越受重視，地處上海魯迅公園的魯迅紀念館在1996年5月1日的參觀者數目就超過了一千人，創造了建館以來日參觀人數的最高紀錄。文學知識份子研究魯迅的熱情也一下子高漲起來，近年來，魯迅研究著作的出版及學術水準都大幅提高。

90年代文學知識份子的魯迅姿態是與90年代的學術文化轉型聯繫在一起的，這個轉型是以重新思考80年代的新啟蒙理念為出發點的。新啟蒙作為一場時代運動的落潮，使得中國知識份子的魯迅姿態出現了兩種分化。

一是走向道德理想主義。在這一部分知識份子那裏，魯迅的「否定者」形象成了在反抗市場經濟下精神墮落的人的理想偶像，魯迅式的憤世嫉俗成了他們的精神寄託。他們在魯迅那裏找到的不是「革命家」魯迅，也不是「啟蒙者」魯迅，而是別一種英雄——以冰冷透骨的目光，以漆黑如夜的否決對待庸眾的憤世嫉俗者，文學知識份子在魯迅那裏尋找的是一個反抗投降（無論是在物欲還是在其他壓力面前）的孤獨的勇士。張煒在〈拒絕寬容〉一文中針對文革中那些活得過於聰明的中國文人說：「我懷疑他們在用這一獨特的方式為自己不夠磊落和體面的昨日辯解。」「我絕不寬容，相反我要學那位偉大的老人。『一個都不寬容』。『『寬容』是指寬闊的心胸有巨大的容納能力，而不是指其他，特別不是指苟且的技巧，那些言必稱『寬容』的人還是先學會『仇恨』吧！」王彬彬在〈過於聰明的中國作家〉中對那些在文革中做縮頭者、沉默者、以默許來助紂為虐的中國文人表現出極大的憤懣，以一種魯迅式的不惜與一切為仇的獨鬥多數的姿態講道：「魯迅是深通世故而不世故，是不屑於世故。深通世故的魯迅卻專愛與社會搗亂，十分不憚於與人結怨。並且說甚

麼：『我所憎惡的太多，理應得到憎惡。』此外尚有李銳的〈虛無之海，精神之塔〉，李小山的〈說不盡的魯迅〉，張承志的〈致先生書〉等。在這一脈絡下，魯迅的意義類似於柏拉圖所說的理念，當人們在現實中感到怯懦，感到有甚麼東西難以抵抗時，人們就開始懷念他；通過懷念他，人們居住於他的烏托邦裏。人們似乎只有在分享了魯迅這個「理念」並確立一種魯迅「姿態」之後才能重新成為知識份子，才有勇氣在這個「污濁的」世界上存在，從而獲得「以一人之力和整個世界為敵」的毅力。然而這一派的魯迅姿態是工具性的，他們利用魯迅的目的是為了在與對手的論爭中得到一個強有力武器，藉以提高自己在話語權利爭奪中的力量和威勢。借魯迅之魂、以魯迅為旗已經成了他們的論戰法寶。工具性的魯迅姿態使他們不可能對魯迅研究有任何貢獻，因為他們對真正的魯迅不感興趣，他們着眼於魯迅的即時性利用價值。我之所以如是說，是因為這一派的魯迅姿態雖有激進的外表，但其內裏卻是保守的，他們所冀望的不過是一個道德理想國，以及烏托邦式的清潔精神。

除此以外，另一種魯迅姿態是以個體主義、感性主義來展開「人」的命題。當啟蒙主義者有關魯迅的一系列論述隨着新啟蒙運動的瓦解而途窮路末時，「啟蒙家魯迅」的堂皇敘事就像當初「革命家魯迅」的堂皇敘事一樣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文革後的新一代中青年學者。他們第一次不依政治思維、政治方式而是靠話語本身的張力，消解了此前中國文學知識份子的魯迅姿態的虛張性，拆解了魯迅身上附加的神性光環，將人格心性的矛盾分裂、思想的苦悶彷徨、寫作的困惑錯位還給了魯迅。在他們的拆解與重合中，魯迅被解釋成為一個悲憤的詩

人，一個鬱悶的小說家，一個充滿內在緊張、焦慮和絕望感的「人」。在錢理群的《豐富的痛苦》、汪暉的《反抗絕望》、王曉明的《無法直面的人生》、吳俊的《魯迅個性心理研究》等書中，魯迅由一個意志統一、行動堅定的「革命家」或「啟蒙家」被還原成了一個個性覺醒又遭受到現實擠壓復而充滿現代人的焦慮與心靈分裂的人。從他身上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個人」在中國現代社會生存的苦難與困頓，這樣就給予了魯迅以全新的解釋。這部分知識份子的魯迅姿態是建設性的、積極的，他們的魯迅是向着世紀末中國的新文化——也就是個體文化的建設而來的，他們筆下的魯迅是他們建設新的個體文化的一種方式。將魯迅還原為感性的、個體的「人」的目的，其實是為了建立以個體和感性的人為本位的真正屬於中國且合乎現時代要求的人學，並以此為建設新的個體文化的突破口，因為個體文化的根本是個體的人的觀念，只有在突破了中國傳統倫理的群體觀念之後，個體文化才有可能誕生。魯迅不僅有一顆豐富的文學心靈，還有一顆深邃的思想家心靈。可以說，他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文學史上思想最深邃，背負時代痛苦最深沉，對時代感悟最敏銳的一個作家。對於這樣一個人的解剖，無疑具有不可辯駁的典型意義。從某個意義上說，這一脈的魯迅姿態是一種合乎時代潮流的、個體的、感性的人的姿態，它的出現是個體文化時代來臨的一個預言。

莫再借魯迅說話

我在另外的文章中說過，90年代的中國文化如果存在一個轉型的話，那就是由群體文化轉向個體文化。由

這一認識出發，9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的魯迅姿態一方面是知識份子建構個體文化的努力，另一方面也顯示了9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缺乏獨立建構個體文化的能力。

中國知識份子為甚麼熱衷於談論魯迅，為甚麼那麼熱衷於利用魯迅來說話？這裏可以理解的原因是，中國知識份子在話語權利分割體制中的弱勢局面。80年代以前，當毛澤東將魯迅定為「聖人」、「最偉大」、「最正確」者時，魯迅已經遠遠地超出了一般人的文化效應場，成為話語合法性的標準，而當代文學知識份子要取得言說的權利就得適應這個標準。80年代以來，這個標準已不是那麼明確，但由於與正統意識形態話語錯位的局面，使得在野知識份子不得不尋找一個接合點，為自己的話語權利尋找支柱。在這種情況下，當代文學知識份子對魯迅的依賴不是弱化了，而是強化了，這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魯迅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知識份子的人格、思想、學術面具。文學知識份子熱衷於以魯迅姿態說話的隱性原因，是中國知識份子過去在意識形態的壓力下長期處於失語地位。沒有自己話語的人只能借別人來說話。過去是意識形態強化人們對魯迅的依賴，而今天當這種強化削弱時，它的影響表現為知識份子的思維慣性——鬆綁之後的知識份子突然感到無話可說，依然習慣借魯迅說話。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哀。也許我們還可以把眼光放得遠一些，這種現象在中國是歷史性的、普遍的，是中國文人的普遍的精神現象——缺乏自己獨特的、與時代發生共振的思想體系，因而只能借用他人說話。這種思維方式在中國古代表現為「注經解經」，到了二十世紀則表現為解魯注魯說魯。

二十世紀出了一個說不盡的魯迅，這是我們的光榮，也是我們的悲哀。我們不僅需要一個魯迅，還需要更多的對民族及至整個人類都有形而上關懷、能為民族及至整個人類的生存提供超越性精神基石的思想者。就此點而言，中國90年代的知識份子的魯迅話語中心、魯迅姿態無疑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值得我們深切反思。面對魯迅的時候，我們除了解魯注魯以外，還應該以甚麼樣的方式和魯迅對話？簡單的重複一種魯迅姿態，作姿態性的魯迅夢是可悲的。世界歷史已經無數次地說明，一個民族如果把某一個人過於聖化，或是把自己禁錮在某個聖人的話語體系中，她將是一個缺乏創造性的民族。

90年代的今天，無論是從市場經濟的建立還是從70年代末開始的知識份子的精神準備而言，當代人通過建立自己話語體系來思考、說話的時機已經成熟。在我們走過了對革命家魯迅的崇拜頌讚（50、60、70年代），對啟蒙者魯迅的宣傳張揚（80年代），對憤世嫉俗者魯迅的激進推崇和對文學家魯迅作為個人的「人」的理解（90年代）之路後，我們如何承受90年代作為文化和學術上的個體時代所賦予我們的使命？活着的魯迅並沒有完成開創個體文化的任務，80年代新啟蒙者的魯迅姿態是矯飾且走叉了路的，而另一派走在對感性個體的肯定之路上，然而僅僅局限於對魯迅的「人」的理解的知識份子，最終亦不能完成新文化的建立。我以為，真正的文化轉型，只發生在知識份子徹底放棄了對「姿態」的依賴，努力以自己本真的面目從事新文化空間建構之後。

葛紅兵 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